

多源同流，奠定齐文化底色

展览第一部分“文明曙光 多源同流”，将时光回溯至数千年前的海岱地区史前时期。后李文化的陶器带着原始质朴，龙山文化的黑陶薄如蛋壳、黑亮如漆，岳石文化的卜骨刻着符号，商代青铜器带着中原与东夷交融的印记。至西周初年，姜太公封于营丘，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，将周礼精髓与东夷本土传统嫁接，齐文化的底色，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悄然奠定。

参展的龙山文化黑陶礼器，是这一阶段具有标志性的重器。这套礼器出土于桓台前埠遗址，现藏于桓台博物馆，包含盘、杯、豆、尊、鼎等10件器物，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、数量最多的成套礼器。龙山时代正值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期，氏族公有制逐步瓦解，家庭私有制兴起，礼制成为维系等级秩序、彰显贵族特权的制度。蛋壳陶等陶器精美而脆弱，并非日常用器，而是贵族阶层祭祀、宴飨、朝聘的专属礼器，是身份与权力的物化象征。这套黑陶礼器规整成套、工艺精湛，不仅印证了桓台一带在龙山时代已是海岱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，更直观呈现了我国早期礼制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，是“礼运东方”的有力物证。

桓台史家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卜骨，则带着神秘的占卜气息。两件卜骨均以羊肩胛骨制成，保留骨骼原貌、未经刻意修整，是典型的早期卜骨形态。骨面可见灼痕与人工刻画文字、符号，虽因残缺无法完整释读，但足以说明，早在夏商之际，海岱地区的东夷先民已形成成熟的占卜习俗与文字符号系统，与中原商文化相互呼应又自成体系，是东夷先民精神信仰与文化智慧的直接遗存。

沂源博物馆藏的商代嵌绿松石铜弓形器，则是商代东夷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。作为车马器，这件弓形器造型奇特，整体呈对称弓状，弓背中部饰凸棱纹、嵌绿松石，两弓臂的臂端装饰有镂空瓣状纹，内置卵石，摇动时可发声。器身几何纹样规整，绿松石镶嵌细密，铸造工艺精巧绝伦。商代晚期，商文化持续东渐，青铜礼器、车马器逐步传入海岱地区，与东夷本土的审美、工艺融合，这件弓形器正是商式技术与东夷审美结合的典范，勾勒出商、夷之间复杂的地缘文化图景。

沂源西鱼台遗址出土的西周铜壶，则展示了姜太公封齐后，周文化与东夷文化深度融合的面貌。这是一件带盖圆壶，器身瘦长，肩部两侧设贯耳，盖为半球形、带圆形捉纽；器身肩部饰窃曲纹，圈足与盖部饰“S”形变体夔龙纹，纹饰兼具周式规范与东夷灵动。最令人惊叹的是，出土时壶内仍留存2900年前的古酒，经科学检测，酒液中含有黍米成分。这是中国早期酿酒技术的珍贵实物，印证了周初齐地农业、手工业的成熟水平。

这一阶段的文物，串联起齐文化从多元源头到初步定型的完整脉络。这些看似沉默的器物，诉说着一种地域文化如何在碰撞中成长、在融合中新生的故事。

齐风泱泱，尽显东方雄邦气象

展览第二部分“齐风泱泱 雄霸东方”，历史的卷轴翻至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地迎来辉煌的巅峰。齐桓公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成为春秋首霸；威宣之际，齐国国力鼎盛，稷下学宫会聚天下诸子，百家争鸣、思想激荡；“齐法化”刀币流

齐风谐韵 海岱雄魂

探展记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4月下旬，“齐风谐韵——齐文化文物精品展”在淄博市博物馆开幕。此次展览由“文明曙光 多源同流”“齐风泱泱 雄霸东方”“秦风汉韵 山河一统”三个部分组成，汇集淄博各地的180件（套）珍贵文物，其中包括28件（套）国家一级文物。

海岱之间，淄水之畔。从后李文化的粗陶、龙山文化的黑陶，到商周青铜器、战国编钟石磬、汉代金错铜戈，每一件文物都镌刻着先民的足迹，每一道纹路都藏着时代的密码。当我们驻足展柜前，看到的不仅是器物本身，更是一个东方方国从萌芽到鼎盛、从独立到融合的完整生命史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海岱地区的生动注脚。

通四海，商业繁荣冠绝诸侯；青铜礼器、兵器、乐器、酒器工艺登峰造极，礼乐文明与尚武精神、商业智慧与思想创新交相辉映，共同铸就“泱泱乎大国之风”的齐文化气象。

临淄商王墓地出土的战国汲酒器，是齐国科技与工艺的代表之作。这件荷蕾形铜汲酒器，以竹节状柄连接器身，巧妙利用大气压强原理实现汲酒、注酒，技术领先世界。器身纹饰精细，竹节排列规整，铸造与设计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。不尚空谈、重视技术、追求实用，正是齐国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密码。

在汲酒器不远处，两件造型精巧的战国时期青铜灯并排陈列，分别是铜鸟柄灯与铜雁足灯。它们均为国家一级文物，出土于临淄商王村战国墓，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。铜鸟柄灯的浅盘中央有一个锥形灯柱，盘底一侧伸出一个圆柄，柄上铸有一只小鸟。小鸟低首引颈，口衔盘沿，两翅并拢，尾部上翘并呈扇形散开，造型灵动、神形兼备，美观又便于用手把持。鸟足用铜铸固定于柄上，小鸟全身刻画有纤细的羽毛，细节处理极为精致，尽显齐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。

铜雁足灯则以雁足为柄，雁足三趾向前，一趾向后，稳稳立于梯形底座之上，膝部和足蹼刻画细致逼真，仿佛一只蓄势待发的大雁，造型庄重而不失灵动。底座上刻有四字铭文，据专家考证，应为墓主身份标识，说明这件铜雁足灯是战国时期一位齐国贵族夫人的生前用器，具有极高艺术价值，为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制度与文字演变，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
展厅中，一组战国编钟与石磬，更是齐国礼乐文化的极致体现。两组编钟均为合范铸成，可见清晰合范痕迹，大小相次，形制统一。钮、篆、枚间饰三角云纹、卷云纹、舞、钲、鼓部饰变体凤鸟纹，羽尾勾卷、线条繁复，钟腔内壁亦模印同款纹饰，内外如一、精细入微，秀出青铜铸造实力。与之配套的石磬，以青白色石灰石制成，出土时分两组排列，东侧10枚、西侧9枚，每枚均有两条天然石纹。经检测，每组石磬均取自同一块石料，按序加工，确保音律精准、音色统一。时至今日，敲击这些石磬，仍能发出清脆悦耳、音律分明的声响。它们并非陪葬明器，而是墓主人生前实际使用的礼乐重器，曾见证齐国贵族“钟鸣鼎食”的奢华生活，印证了齐国作为东方礼乐大国的地位。

这一阶段的文物，是齐国国力、文化、科技全面领先的实物证明。齐文化的“变革”，体现为管仲改革、顺应时势；“开放”，体现为通商天下、会聚诸子；“务实”，体现为重视技术、富民强国；“包容”，体现为兼收并蓄、海纳百川。

海内一统，融入中华文明洪流

展览第三部分“秦风汉韵 山河一统”，将历史推进到秦汉大一统时代。秦灭六国、海内一统，汉承秦制、气象恢弘。齐地不再是独立王国，不再齐

文化并未就此消亡。

临淄大武汉墓出土的西汉金错铜戈，是汉代仪仗与礼制的实物见证。错，是戈、矛等兵器木秘下端的金属护套，用于保护木秘，防止腐坏。这件铜戈所配金错，以420克纯金与铜复合制成，器身饰四道凸弦纹与卷云纹，线条流畅、工艺精美。黄金珍稀且质地偏软，不适用于实战兵器，因此这件金错铜戈绝非实用兵器，而是汉代贵族出行、祭祀时使用的仪仗礼器。据木秘残迹推算，原戈、秘、错总长1.86米，尽显威仪。它的存在，证明齐地的青铜工艺、金银细工在汉代依然领先，齐地的礼乐传统，已被纳入大一统帝国的礼制体系。

临淄大武汉墓出土的西汉铜骰子，则从日常娱乐的角度，展现汉代齐地的文化繁荣。这件铜骰子直径4.9厘米，为双空心球结构，内置小铜块，共十八个面。其中十六面错银篆书结合的“一”至“十六”数字，相对两面错“骛”“妻畏”字样，球面还镂空八个三叉形孔。骰子是中国传统博戏“六博”的核心器具，汉代博戏分大博、小博，有投箸、投堇之分，这件铜骰子即属投堇类。它的出土，说明了汉代齐地娱乐文化的丰富，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齐地经济繁荣、社会稳定、生活多姿多彩。

这是一场华丽的转身。齐地的冶铁技术推动汉代铁器普及，纺织技术成就“齐纨鲁缟”的美名，农耕经验助力全国农业发展；稷下诸子的思想，被董仲舒等学者吸收融合，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重要源头；齐地的工艺、审美、习俗，渗透到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
当我们凝视这些古朴典雅的陶器、锈迹斑斑的青铜器时，我们看到的，是在一片名为“齐”的土地上，一代代先民走过的足迹、创造的文明、沉淀的智慧；我们看到的，是这片土地从区域方国到东方雄邦，最终融入中华文明长河的壮阔历程。

博物5分钟

一只青铜瓶里的小国风云

□ 本报记者 梁雯

说起瓶子，我们见得多了。但在春秋时期，有一件独一无二的青铜瓶，不仅自铭为“瓶”，长得也和我们印象中的瓶完全不同。更珍贵的是，它的盖、器上有一段铭文，短短21个字，藏着春秋小国的“朋友圈”，也揭示着小邦国五百余年的外交生存史。

2002年6月，枣庄东江村小邾国墓地一号墓，出土了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——金父瓶。作为春秋早期器物，它的外观在同时代青铜器里几乎找不到同款。它整体呈鸟卵形，也像水滴形，子母口，通体素面无纹饰，口径14.2厘米，高26.5厘米，重2.7千克。瓶盖为圆锥形，顶部有圆饼形钮，盖与器两侧各有一对中空贯耳，可以穿绳提携。



金父瓶 枣庄市博物馆藏

比外形更罕见的是它的盖、器对铭，铭文从右向左看依次是：“雷父君金父作其金瓶，眉寿无疆，子子孙孙永宝用之”。别小看这21个字，其中可大有文章。比如“瓶”这个金文，在青铜器上是首次被发现。关于“金瓶”两个金文，有学者把其解释为“仓瓶”，后经多方考证，学界多倾向于解释为“金瓶”。争议最大的则是铭文开头“雷父君金父”五个字，有学者认为，“雷（灵）父”是指媯灵之父，此瓶是金父为女儿所作的陪嫁器。那么媯灵又是谁？在小邾国墓地三号墓出土了两只“昆君媯媯”壶，有学者猜测媯灵可能来自昆国，通过联姻成为小邾国国君的夫人。也有学者主张，“雷父”是国名，金父是灵父国君的私名。

从诸多猜测可以看出，金父瓶应该不是小邾国制造的。若“雷父”为媯灵的父亲，金父瓶可能来自昆国。有学者根据春秋时期媯姓族群主要分布在晋南、淮河流域，认为昆国应在晋地，也有学者推测昆国位于鲁西南，与小邾国临近。若“雷父”是国名，金父瓶可能来自灵父，有学者推测灵父国应在小邾国附近，大致在今山亭区中陡村一带，这一说法仍有待考古证实。由以上推测看，金父瓶很可能是陪嫁媯器或助丧的赠赠之器，这件外来的“瓶”，代表的很可能是春秋时期两个小国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。

在小邾国墓地中，出土青铜器203件，其中带铭铜器24件，包括鼎、壶、鬲、匜等，铭文内容复杂，涉及众多国族、姓氏、婚姻制度等。其中媯侯盥与金父瓶一样，都是国君级别的青铜器。媯侯盥来自媯国，关于媯国与小邾国的关系，文献记载较为清晰。在春秋中晚期两国应是盟友，共同参与了20余次由齐国或晋国主导的会盟，是乱世中典型的“小国抱团”。



小邾国故城遗址公园

春秋乱世，小国之间“抱团取暖”还不够，想要生存下去，最重要的是要跟对“老大”。作为山东古国之一，小邾国五百余年的“生存史”，生动地诠释了这个道理。小邾国封于周宣王末年，战国晚期为楚国所灭。王献唐先生曾说过，小邾这个称呼，其实不算一个国家正式的名称，因为“立国不自称小，邻邦亦不能以小呼之”。小邾国之所以被叫做“小邾”，与“邾分三国”有关。春秋战国时，邾国陆续分为三个国家，分别是邾、小邾、滥。小邾国出现于周宣王时期，当时邾国国君夷父颜伐楚有功，周宣王封其子邾友父于邾国。周惠王时期，小邾国的发展迎来又一“里程碑”。当时小邾国依附齐国，在齐桓公推荐下，小邾国被封为子爵，始列诸侯。

从地理位置看，小邾国北有齐、鲁，西有宋，在大国环伺下只能依附霸主。春秋前期，小邾国已是宋国附庸。随着齐国发展壮大，小邾国希望借助齐国摆脱宋国控制，积极追随齐桓公。后来晋国称霸，小邾国又依附晋国，但同时仍受制于宋、齐等大国。小邾国对鲁国一直十分恭敬，但因国小势弱，没有受到鲁国的优待。在只看“硬实力”的春秋战国，像小邾国这样的小国想要长久生存，实属不易。



龙山文化黑陶礼器



铜鸟柄灯



西周铜壶



西汉龙纹矩形铜镜

“中华第一铜镜”，映见齐地荣光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”。国家一级文物、有“中华第一铜镜”之称的西汉龙纹矩形铜镜，无疑是“齐风谐韵——齐文化文物精品展”中最受关注的文物。

铜镜通常又小又圆，便于携带使用，这件1980年出土于临淄西汉初期齐王墓陪葬坑的铜镜，却有些另类。该铜镜外观呈矩形，长115.1厘米，宽57.7厘米，重量达到了56.5千克，看着挺豪迈，其厚度却只有1.2厘米，非常纤薄。方形镜因应力不均极易破裂，可以想见这一“巨无霸”的铸造难度有多大，汉代的铜镜技术又有多发达。

再看背面，上面装饰着浅淡凸起的浮雕

龙纹，龙身蜿蜒，张嘴吐舌，充满动感。龙纹被有意识地拉长，与镜子的形状相适配，线条刚劲流畅，神采飞扬。镜子的边缘饰有连弧纹，在四个角落和中心位置各有一个拱形三弦钮，每个钮的底座有柿蒂纹，可能是为了将铜镜固定在底座或柱子上。

出土时，铜镜的正面和背面均带有少许绿色铜锈，并且已经断为三截。铜镜正面光滑平整，虽经历两千多年，局部仍光亮可鉴。它是目前我国出土的面积最大、器重最重的铜镜，形体庞大、气势宏伟，铸造精湛，绝无仅有。

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？有人猜测是穿衣镜或辟邪镜，也有人猜测是墓主人的身份象征。2015年，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

类似方镜，有人认为是古籍中记载的“温明”，系悬挂于棺内的丧葬器物。

根据规定，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。2002年，国家文物局印发《首批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目录》，西汉龙纹矩形铜镜榜上有名，与曾侯乙编钟、长信宫灯、三星堆青铜神树并列。截至目前，全国共有三批、195件文物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，山东仅有两件。出于保护铜镜的需要，淄博市博物馆平时只展出复制品，真品仅在几次特展中亮相。

这件国宝出土于临淄并非偶然，考古工作者已在齐国故城内发现四处铸镜遗址。早在战国时期，当地的制镜工艺已相当成熟。1964年临淄商王村战国墓就曾出土一件错

金银错嵌绿松石铜镜，它因工艺复杂、制作华丽，在古代青铜镜制造史上留下大名。两汉时期，临淄与四川广汉、浙江会稽并列，是全国铸镜中心。数十年来，临淄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铜镜，有蟠螭纹镜、草叶纹镜、龙纹镜、双圈铭文镜、日光镜、星云镜、昭明连弧纹镜等。

从1940年到2006年，临淄还先后出土了8批100余件西汉镜范。它们是用来铸造铜镜的模子，其数量之多、种类之全，为国内首屈一指。出土镜范均为夹细砂质，断面有大量不连续的大小不均的空隙，质量较轻。按其形制结构和使用方法，可分为镜背范和镜面范两类。其中，镜面范是全国首次发现，对于研究汉代铜镜铸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。